

全面理解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

吴岳添

恩格斯在 1888 年 4 月给哈克纳斯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论现实主义的信。他在信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定义,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大家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对这个定义都很熟悉,不用多说。当然,在 20 世纪现代派文学迅速繁荣的情况下,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问题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恩格斯在当时提出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用于评价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不过由于这两位大作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存在着一个可比性问题:巴尔扎克生于 1799 年,死于 1850 年;左拉生于 1840 年,死于 1902 年。也就是说,恩格斯在作出这个评价的时候,巴尔扎克已经去世了 38 年,完全可以盖棺定论了;而左拉才 48 岁,还是个中年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 and 变化之中,人也是在不断地成长和变化的。恩格斯是革命导师,不是算命先生,他决不会预言左拉的将来如何不

好,因此恩格斯所说的“将来的一切左拉”决不是指左拉本人的将来,而是指将来可能有的像当时的左拉那样的作家。这就说明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只是就巴尔扎克的创作和左拉当时的创作所作的比较,而不是对左拉的定评。

其次就创作本身而言。在 19 世纪,由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动荡不安,不像古典主义时代那样相对稳定,所以一个作家往往兼有几个流派的特色,很少有完全属于一个流派的作家。例如在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当中,巴尔扎克的《驴皮记》、《绝对之探求》等小说都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充满了异国情调,更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所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把他们都算成法国的浪漫派。左拉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早期的小说《给尼依的故事》等是浪漫主义的,他的 20 卷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虽然有着自然主义的烙印,但基本上是揭露社会现实的;而在恩格斯发表这一评价之后的 90 年代,他的作品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卷本小说《三名城》猛烈地批判了教会的腐朽和卑鄙,有力地配合了法国当时进行“政教分离”的现实斗争;《四福音书》充满了对未来的集体社会的憧憬,使作品又一次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因此要对巴尔扎克和左拉进行全面的比较,就需要充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不过他们的作品太多,实际上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恐怕也很难全部看完。恩格斯的革命工作那么繁忙,要他一本一本地去读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小说,当然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由于什么流派什么桂冠都是后人加给前人的,这就难免带有一刀切的主观性,因此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我们常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其实根本不是一个自觉的流派。这些作家的创作各不相同,巴尔扎克善于刻画性格,司汤达擅长心理分析,梅里美喜欢异国情调,福楼拜注重锤炼语言。巴尔扎克好像是这个流派的领袖,其实他到死都没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更没有带领其他作家搞过什么

宣扬现实主义的活动。现实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 1855 年,画家库尔贝因为他的作品《石匠》、《浴女图》过于“现实”而被巴黎万国博览会拒绝,他就办了一个名为“现实主义”的个人画展,这个名词才流行起来。而到高尔基提出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离这个流派实际存在的时间已经有一个世纪了。

左拉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在著名作家队伍中是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位。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受到资产阶级批评界的围攻,官方和学校的图书馆都拒绝收藏他的作品。左拉在 1887 年发表小说《土地》,以极为通俗的语言描绘了法国农村的落后与愚昧,批评界对他的围攻因此达到了顶点,其中有五个年轻的自然主义作家出来发表反戈一击的声明,使自然主义作为文学流派趋于解体。我认为恩格斯在 1888 年作出的对左拉的评价,与这种形势的影响恐怕不是完全无关的。直到 1889 年左拉快要写完长达 20 卷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就是可以说功成名就的时候,法国国民教育部仍然拒绝把他的作品收入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图书目录。如果说恩格斯只是说左拉不如巴尔扎克伟大的话,到了卢卡契的笔下,自然主义就成了颓废主义,成了帝国主义没落腐朽的文化了。卢卡契把苏联 30 年代小说的平庸也归咎于自然主义,这种对恩格斯观点的教条主义的搬用,使左拉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里长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自然主义几乎成了反动、黄色文化的同义词。

左拉备受攻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而作家的理论往往会被批评家加以夸张,正如纪德所说的那样:“巴尔扎克一直在寻求一种关于激情的理论,但是始终未能找到,这是他的幸运。”^①但是巴尔扎克同情的是贵族阶级,对他们的讽刺却最为辛辣,对作家要用作品而不能只用他的宣言来衡量,因为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完全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其实左拉的

① 法国《费加罗报》,1987 年 4 月 13 日。

思想要比巴尔扎克进步得多,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皇党,而左拉则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9世纪末震动欧洲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成为法国进步力量的领袖。即使就作品本身而言,左拉也有独到之处,他更多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尤其在《萌芽》中第一个描写了法国的工人运动,他的《四福音书》不仅反映了围绕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的法国社会现实,而且几乎就是在直接宣传社会主义。因此他虽然发表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实际上,自然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生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它固然有强调人的遗传性和生物性的一面,但也有更准确地表现真实、扩大题材范围和丰富表现手法的优点,所以西方、日本和拉美的许多评论家对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不加区别的。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和劳苦大众始终欢迎他的作品。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左拉小说的袖珍本就已发行了近1000万册,仅《萌芽》一书就发行了113万册,至今畅销不衰,而且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因此左拉和莫泊桑这样的自然主义作家,现在可以说已被公认为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了。

我想再以恩格斯写给拉萨尔的信为例,说明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当成一字不改的经文。恩格斯在信中说,拉萨尔的剧本《西金根》“值得另眼看待”,使他阅读时“不吝惜那份时间”,甚至“在情绪上这样强烈地受到感动”;而他在读萨克雷的小说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这种地步”。对这些话,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如果我们把恩格斯的每句话都当成不变的教条,那么就应该认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萨克雷,不如文学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的拉萨尔,这显然是错误的;或者我们承认恩格斯也有个人的爱好,那么他对某个作家的评价就可以作为一种观点来讨论,而不应该成为后人永远不变地遵循的惟一标准。否则的话,当我们得知“列宁非常欣赏左拉,认为他是德雷福斯的勇敢的

维护者,而且很喜爱他的小说《萌芽》”^①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呢?

邓小平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中包括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革命导师的个别论点。列宁如果不提出和马克思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观点,就不会有苏联;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走与苏联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会有新中国;小平同志如果不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观点,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昌盛的局面。不过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本文所否定的不是恩格斯的观点本身,而是后人对这一观点的误解。因为在我看来,恩格斯的本意在于赞扬巴尔扎克。所以我对恩格斯这段话的理解是: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比左拉伟大得多,正如我们可以说鲁迅比巴金伟大得多一样,意思不是贬低巴金而是赞美鲁迅。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好比说太阳比月亮明亮得多,意思不是贬低月亮而是在赞美太阳。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① M. 雅洪托娃等著《法国文学简史》(郭家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9页。